

江西通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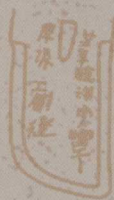
2

秦汉卷

钟起煌 主编

卢星 许智范 温乐平 著

江西出版集团·江西人民出版社



主 编 钟起煌

顾问 周銮书

副主编 邵 鸿

彭适凡(常务)

方志远



江西通史

江西出版集团·江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江西通史·秦汉卷/钟起煌主编;卢星等著.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12

ISBN 978-7-210-04026-2

I. 江… II. ①钟…②卢… III. 江西省-地方史-秦汉
时代 IV. K29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13101 号

江西通史·秦汉卷

卢星 许智范 温乐平 等著

江西出版集团

江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16.25

字数:280 千 印数:1-3200 册

ISBN 978-7-210-04026-2 定价:32.00 元

江西人民出版社 地址: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
邮政编码:330006 传真:6898827 电话:6898893(发行部)

E-mail: jxpph@163.net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江西通史》编辑委员会

主任 钟起煌

副主任 钟健华 傅伯言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方志远 孙家骅 邵 鸿 林学勤 彭适凡

编委会办公室

主任 孙家骅

副主任 游道勤

工作人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琴红 王紫林 曾 敏

常务编辑

林学勤 徐建国 游道勤

江西通史

秦汉卷

卢
星
许智范
温乐平
著



①



②



③



④



⑤

① “临汾守”青铜戈 秦王政二十二年（公元前225年）长23.8厘米、
胡（残）长10.8厘米 1976年遂川县藻林乡出土

② 西汉连弧缘星纹镜 面径14.9厘米 1974年南昌市出土

③ 西汉重圈纹昭明镜 面径11厘米 1974年南昌市出土

④ 东汉八乳规矩纹王氏镜 面径16.1厘米 江西省博物馆藏品

⑤ 东汉半圆方枚神兽镜 面径13.9厘米 1972年新建县出土



①



②



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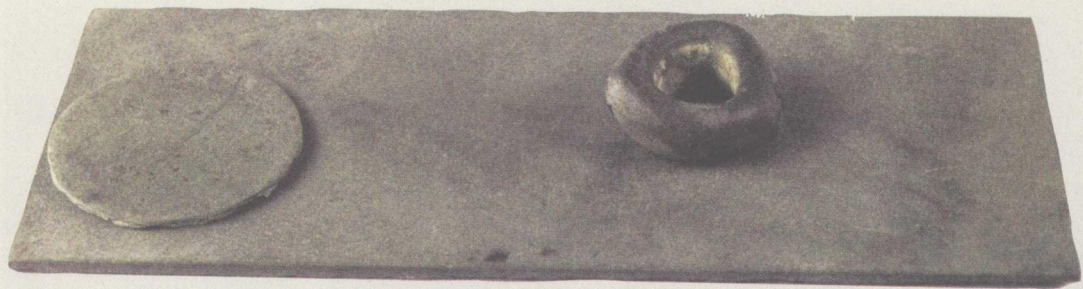
① 西汉青瓷铺首带盖壶

高44.5厘米、口径14.7厘米、底
径18.7厘米 1982年南昌市
出土

② 西汉镂空雕舞女玉佩件 1973
年南昌市郊出土

③ 西汉青瓷水波纹簋

高11.4厘米、口径22.8厘米、底
径12.8厘米 1961年修水县上
背圩 高岭出土



①



②



③

① 西汉石黛砚 长方板长14厘米、宽5.5厘米 圆垫板直径3.5厘米、厚0.3厘米 砚圈高0.7厘米、直径2.7厘米 1973年南昌市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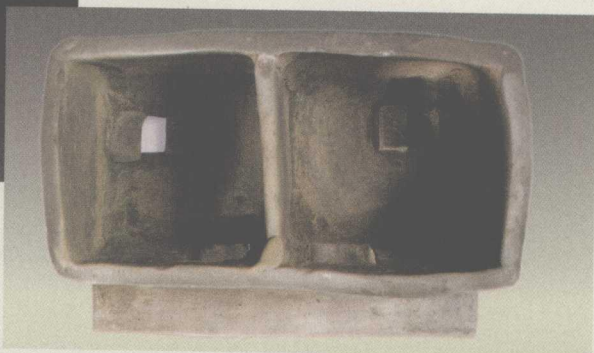
② 东汉五铢钱铜铸范 萍乡市博物馆藏品 刘敏华供稿

③ 西汉“安成侯印”金质印章 2007年莲花县出土

④ 东汉悬山顶双间陶厕所 通高22.4厘米、长22.8厘米、宽12.5厘米 江西省博物馆藏品



④





①

① 东汉绿釉陶灶 高35.2厘米、长56厘米、宽28.2厘米 1960年南昌市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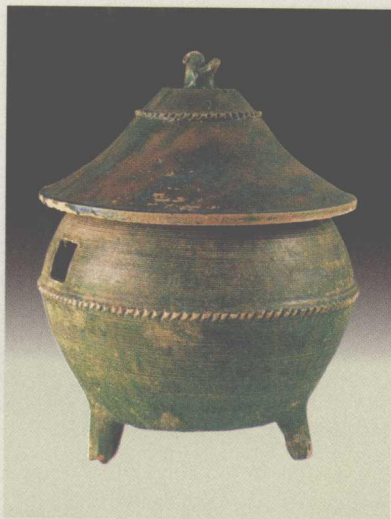
② 东汉绿釉陶尊 1960年南昌市出土

③ 东汉绿釉三足立鸟陶仓 1960年南昌市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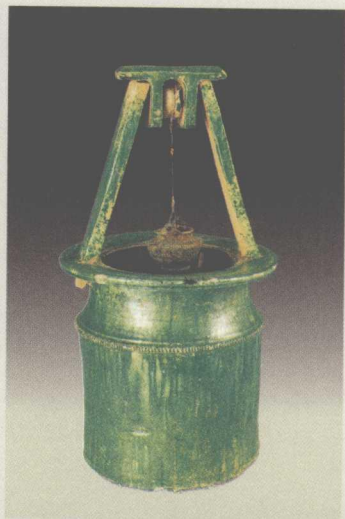
④ 东汉绿釉滑轮陶井 通高38厘米、口径19.5厘米、底径20.1厘米 1960年南昌市出土



②



③



④

总序

钟起煌

世界上的很多事情都是由机缘而起因执著而成,包括我们这部《江西通史》。

说由机缘而起,是因为这件事情的发生几乎纯属偶然。2002年夏天,我和彭适凡、孙家骅同志谈到江西悠久的历史、谈到江西辉煌的文化,因而产生了组织专家编撰《江西通史》的设想,彭、孙二位当即认为此举当行而且可行。

说因执著而成,是因为一旦有这个想法,而且认为这是一件研究江西历史、弘扬江西文化的重要工程,就决心去做。为此,我征询了周銮书同志的意见,并邀请邵鸿和方志远同志共商此事,得到他们的热烈响应。2002年10月18日,在江西省文物局和江西师大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共同举办的全省文博教育成果展示与经验交流会上,我向大会通报了编撰《江西通史》的意见,引起全体代表的热烈反响,大家用长时间的热烈掌声表示支持,认为这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挖掘和整理江西传统文化、推进江西经济文化建设的一大盛事。有了这个共识,12月13日,准备工作进入实质性阶段。在我的主持下,召开了有关专家和编辑人员的联席会议,对编撰《江西通史》的指导思想、作者人选、工作日程、成果形式等具体问题展开了比较细致的讨论。2003年2月15日,召开了第一次编撰工作会,《江西通史》的编撰工作就此正式启动。

虽然说是机缘和偶然,但新的《江西通史》的编撰,实具备诸多因素和条件。

一、江西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根据最新的考古发现,在江西这块土地上,人类的活动至少已有20万年历史,它是中华民族发展史和古代文明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唐末五代以来,随着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江西遂为

全国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省份之一,其物产之富、人才之众,举世瞩目;进入20世纪,江西又因为中央苏区的建立而成为全国苏维埃运动的中心。很难想象,在十分漫长的时段里,没有江西的中国历史将会是什么样子。

二、文献与实物资料丰富。江西既有“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誉(唐王勃语),又素称“文章节义”之邦(宋司马光语)和“人文之薮”(清乾隆帝语),存世官修私撰文献极为丰富。近年来一系列的考古发现,既可弥补文字记载之不足,更可与文献资料相互印证,为编撰《江西通史》提供了可供参考的实证材料和科学依据。

三、前期成果丰硕、学术队伍整齐。老一辈的历史学家仍然健在,他们不但学术积累深厚,而且对研究江西历史有着强烈的责任心;中青年学者正趋成熟,他们继承了前辈学者的严谨学风,又吸收了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技术,思维敏捷,勇于创新。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这些年来已有大批高质量的有关江西历史的学术成果问世,这些成果涉及江西历史的方方面面,为编撰《江西通史》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四、政治环境宽松、经济形势发展。盛世修志是中国的传统。改革开放以来,政通人和,国泰民安,江西经济和全国一样,有较快速度的发展。这为编撰《江西通史》提供了自由的学术气氛和比较充裕的财力保证。近年来,江西的学术事业和出版事业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连续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和国家图书奖、中国图书奖,给江西文化艺术界和学术界以振奋,也引起了各兄弟省市的关注。这些成就的取得,为我们组织大规模著作的编撰工作提供了经验。而周边各省如湖北、湖南、浙江以及其他省市新编通史的纷纷问世,对《江西通史》的编撰是有力的推动,也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五、从我个人来说,当时也恰恰能分出一些精力和时间来抓这件事情。于是尽力协调各方面的关系,为作者们、编者们排除各种障碍,以保证这项重大工程的圆满完成。

四年来,《江西通史》的编撰工作得到了各方面的关心和支持。黄智权、吴新雄省长亲自过问此事并指示有关部门给予支持,省政协将其作为一件大的文化事业进行推动,省社联将其列为重大科研项目,江西师大、南昌大学、省社科院、省文物局、省博物馆和省考古所等有关单位也对参与编撰的专家们给予各种便利,出版部门派出了强大的编辑班子并准备了足够的启动和出版资金。特别要指出的是,各位作者在繁忙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中,能够将《江西通史》的

写作列入重要的工作计划并全身心地投入。我在第一次全体编撰会议上指出,《江西通史》的编撰是一项挖掘和弘扬江西历史文化传统的千秋事业,希望作者和编者将其视为自己学术生涯中的事业。事实证明,作者和编者后来都是这样要求自己的。正是因为有了各方面的支持和全体编撰人员的共同努力,11卷的《江西通史》才能顺利地完成书稿并得到如期出版。

明代中期,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修撰地方志成为一大文化现象。各省、各府乃至各县的省志、府志、县志大量涌现。此后遂为传统。盛世修志也不仅仅限于修前朝历史,更大量、更具有普遍意义的乃是修当地地方史。具有全局意义的江西省志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产生的。自明中期以来,江西整体史著作已编撰过多部,其中著名的有:林庭棣《江西通志》(37卷,明嘉靖四年),王宗沐《江西省大志》(8卷,嘉靖三十五年;万历二十五年陆万垓增修),于成龙、杜果《江西通志》(54卷,清康熙二十二年),白潢、查慎行《西江志》(206卷,康熙五十九年),高其倬、谢旻《江西通志》(163卷,雍正十年),刘坤一、刘绎、赵之谦《江西通志》(180卷,光绪七年),吴宗慈、辛际周、周性初《江西通志稿》(9编,民国三十八年)。20世纪末,又有许怀林的《江西史稿》(1994年,江西高校出版社),陈文华、陈荣华主编的《江西通史》(1999年,江西人民出版社)问世。这些著作在保留江西历史遗存、挖掘江西历史文化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如何在充分吸取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有所创新,是对新编《江西通史》的考验。

为了使新的《江西通史》更具有时代特色和历史价值,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我们对这部著作提出了以下的要求。

一、中国历史是一个整体,我们在研究任何地方历史的时候,都不能脱离这个整体。因此,正确认识各个历史时期江西在全国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就显得尤其重要,必须充分关注江西与中央、与周边地区的关系,不溢美、不自卑,不关起门来论江西,将《江西通史》写成一部与中华民族的整体有着血肉联系的江西历史。

二、《江西通史》是系统记述和研究江西历史的大型学术著作,由众多学者共同参与完成。一方面,各卷是作者的个人成果,是作者最新研究成果的结晶,可以也应该有自己的风格和特色,所以希望作者精益求精,使其成为各自领域的学术精品。另一方面,甚至更为重要的是,它又必须是一个整体,是一部“通史”,所以全书11卷必须有统一的体例和统一的要求,在文风上一定要力求简洁、明快。各卷作者务必服从整体、服从大局,使自己的作品成为整个《江西通

史》的有机组成部分。

三、《江西通史》必须是一部真实、动态、有可读性的信史。所谓真实,是指史料翔实、言必有据。此“据”是经过考证后认为合理的,否则,“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孟子语)。这就需要每个作者既尽可能地系统爬梳和挖掘史料,又谨慎辨析和使用史料。所谓动态,是指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既将问题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又特别关注它的演进过程,因为即使是同一件事物,其状态和作用也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变迁而变化的。这就需要每个作者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阐释历史、去探讨历史演进的规律。所谓有可读性,是指应该用流畅的文字、叙述的方法写作,展示的是作者的观点和结论,而不是考辨的过程,它的体例是史书而不是论文。无图不成书。图文并茂是中国出版物的优良传统和重要特点,《江西通史》应该在尽可能的情况下,收集能够说明江西历史各阶段各方面状况的历史图片,以加强其历史感和可信度,同时也使其更具有可读性。

四、以人为本,以民为本,以基层社会为本。所谓以人为本,指的是要写成人的历史,以人的活动为描述对象,即使是制度、习俗,也应尽可能地有人的活动。所谓以民为本,指的是尽可能地站在大众的立场上来叙述历史、看待历史,更多地叙述大众的活动。所谓以基层为本,是因为地方史本身就是基层乃至底层的历史,要尽可能地揭示基层组织和底层社会的活动状况。在此基础上,充分重视统治者和社会精英对社会的主导作用,重视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特别是包括传统价值观念和现实政治制度等在内的上层建筑对个人、对大众、对底层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写成一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互动、国家权力与基层社会互动、社会精英与人民大众互动的历史。

11卷本《江西通史》即将付梓,我们希望它的出版能够成为江西历史研究的新的里程碑、能够成为江西文化史上的一大盛事。当然,能否达到这个目标,还要由读者和历史来检验。

引言

公元前221年,秦国大军以摧枯拉朽之势突入齐都临淄,迫降齐王田建,结束了春秋战国长达550年列国纷争的分裂割据状态。中国历史从此进入了空前统一的秦汉时代。

秦汉共历441年,包括了三个前后相继的统一王朝:秦朝、西汉、东汉。两汉之际,还一度出现过由外戚王莽建立的新朝^①和由绿林军拥立的更始政权。

秦朝是一个继往开来的朝代。“继往”是说秦作为正式的诸侯国,早在东周初年平王东迁时就已经出现,她既有华夏血统,又与西戎杂处,既能吸收中原先进政治、经济、文化之长处,又不受其传统礼教之束缚,遂由一个西陲小国逐渐发展壮大,直至横扫六国统一天下。“开来”是说秦始皇在短短十几年时间内,缔造了一个令世人瞩目的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东方大帝国,他开创的一套全新的政治制度,包括皇帝制度、三公九卿制度、郡县制度以及基层乡里什伍制度,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帝制时代政治制度的基础。虽然因其贪权暴戾,赋役繁重,刑法苛残,招致四方反叛而迅速灭亡,自汉以后历朝历代也都斥之以暴君、独夫、民贼,但直至1911年清帝被迫退位,没有一个君主愿意把秦始皇创造的“皇帝”称号去掉。

秦朝被推翻后,曾经同是反秦领袖的项羽和刘邦,为争夺最高统治权,进

① 王莽篡汉后建立的新朝(公元8—23年),不仅未能创“新”,反而因托古改制的失败而激化了社会矛盾,招致各方反对而迅速败亡。故学界一般视之为西汉后期帝国颓势的延续,不将其单独列为朝代。

行了长达四年的楚汉战争,最终以刘邦的胜利而告终。汉高祖五年(前202年),刘邦在众臣一再请求下,半推半就地登上了皇帝宝座,定都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史称西汉或前汉。

西汉可分为前、中、后三个时期:(1)西汉前期(前202—前141年),自高祖至景帝,是西汉国家机器重建、社会经济和国力恢复的时期;(2)西汉中期(前140—前75年),历武、昭、宣三代,是西汉极盛时期;(3)西汉后期(前74—公元23年),从元帝到王莽,是西汉逐渐衰亡时期。

西汉初年,一方面,以黄老“无为而治”思想作指导,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致力于发展社会经济,稳定社会秩序;政治上基本承袭秦制,“萧规曹随”,一切去繁就简。另一方面,刘邦在总结秦亡教训时产生严重失误,剪除异姓诸侯王的同时,又先后分封了一批同姓诸侯王。文景时,同姓诸侯王势力恶性膨胀,终于酿成“吴楚七国之乱”。叛乱被平定后,景帝、武帝降低了王国的地位,使郡国并行制名副其实。^①汉武帝亲政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击匈奴、平两越、通西域,奠定了疆域辽阔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版图。虽因连年征战导致“海内虚耗,户口减半”,但武帝晚年下罪己诏,纠正了政策偏差,再经昭、宣两代努力,社会重趋稳定。元、成以降,西汉王朝逐渐衰落,因豪族兼并造成的土地集中、农民奴婢化问题日益严重,社会矛盾尖锐,外戚王莽趁机夺权,于公元9年建立“新”朝。王莽试图通过改制来缓解社会危机,但因其措施不当反而激化了社会矛盾,使其新朝在绿林、赤眉军的打击下,迅速灭亡。

新莽败亡后,群雄并起,全国陷于割据混战。汉宗室后裔刘秀逐渐掌控局面,并次第削平群雄,于公元25年重建汉朝,因定都洛阳(今河南洛阳东),史称东汉或后汉。

东汉一般分为两个时期:(1)东汉前期(公元25—88年),历光武、明、章三帝,是社会经济恢复发展、集权政治进一步强化时期;(2)东汉后期(公元89—220年),自和帝至献帝,是皇权旁落、缓慢衰落直至名存实亡时期。

光武帝刘秀奉行“柔道”治国思想,偃武修文,致力于发展经济,强化中央集权,至明、章两代,国力稳步上升,和帝初,达到极点。其标志性事件是,汉军大举出击北匈奴并将其彻底逐出漠北,但这已是强弩之末。此后皇帝一个接一

^① 参阅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秦汉地方行政制度》,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7年版,第35页。

个地早立和早夭,使得皇权旁落,外戚、宦官交替擅权,政治陷于黑暗,中央统治力削弱,内不能抑制豪族兼并和州郡势力的扩张,外无法制止鲜卑的袭扰和西羌的反抗,民族矛盾尖锐,阶级矛盾激化,终于导致黄巾大起义。利用镇压起义之机扩充实力的各州郡长官和地方豪族,纷纷拥兵割据,中央对地方完全失控,军阀混战全面爆发。献帝建安元年(196年),颇具远见卓识的曹操捷足先登,将汉献帝劫往许昌。建安五年(200年)经官渡之战击垮袁绍,统一北方。延康元年(220年),其子曹丕废献帝自立,东汉正式宣告灭亡。

对于秦汉史的断代,上限无异议,定在秦灭六国的公元前221年。但对下限的划定,长期以来学界并不一致,有189年(董卓进京,立刘协为傀儡皇帝,即汉献帝)、196年(曹操挟持献帝)、208年(赤壁之战,三国鼎立局势奠定)、220年(东汉王朝正式终结)等多种不同划分。本卷论述的是秦汉时期江西历史,时间上将以220年作为结束的标志性年份。因为,虽然189年后东汉已名存实亡,但在曹魏代汉前,各股势力都未抛开汉的旗号,相互争战也无不假借汉室正统之名。从涉足豫章的几股势力看,除袁术一度僭号瞬间败亡外,扬州刺史刘繇、豫章太守华歆、讨虏将军孙策等无不领受汉朝官号。这样断限肯定会使得本卷某些内容与魏晋南北朝卷重叠,但从当时江西的实际情况及本卷的完整性看是必要的。

秦汉时期的江西,经过了一个无郡级机构到有郡级机构,再到郡级机构扩展的变迁过程。就此而言,秦代是承前启后的过渡阶段。秦统一前,江西长期处在“吴头楚尾”的中间地带,史书中只留下“艾”“番”两个难以断定是否县邑的地名。楚灭越后,江西地属荆楚,但依然是不受楚国重视的边缘地区,直到秦灭六国后,今江西省境的轮廓才隐约显现出来。当时的江西属于治所设在淮水南岸寿春(今安徽寿春)的九江郡,虽然对于当时江西境内究竟设有几县,后人作过种种猜测,多者十县,少者三五县,谭其骧在其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淮汉以南诸郡”里非常谨慎地标有“番”和“庐陵”两县,但真正可考或推断的只有番、艾及余汗、南埜几县。这多少会使人感到沮丧,难道占有九江郡绝大部分的江西地区只有2~4个县?其实这并不奇怪,与江西相邻的福建省,是两汉会稽郡面积最大的部分,然直至东汉也还只有一个东冶县(今福建福州)。秦汉设县并非看土地广袤,而是依户口众寡,元始二年(公元2年),辖有18县的豫章郡在籍人口才35万多人,秦时江西能有多少户口呢?所以说,当时的江西处在一个短期的过渡阶段,这个阶段虽然只有15年,但江西地区还是发生了较大

变化。

史书记载秦朝的管辖范围是：“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①这是秦在兼并六国后通过北逐匈奴、南攻百越战争最终形成的疆域。用兵百越前，江西的“边缘”地位仍未改变；征服百越后，江西即成为“内地”了。

其次，秦征百越时，发兵50万分五路南下，其中有两路分别屯驻于江西境内徐汗和南壁（今南康市南大庾岭）。故《淮南子》称：“秦之时……丁壮丈夫，西至临洮、狄道，东至会稽、浮石，南至豫章、桂林，北至飞狐、阳原，道路死人以沟量。”^②其中“南至豫章、桂林”显然是指戍守或转运军需物资于汉时豫章境内。可见，江西的边防战略地位及其通往岭南和闽中的交通地位已凸显出来。

至西汉，豫章郡设立，辖18县，使今天江西省区的规模初步奠定。东汉期间，郡县机构不断增多，由21县到26县（含侯国），又由1郡26县到3郡35县。这自然是当时江西经济开发、人口增长、政治地位上升的结果。然而，两汉史书中涉及豫章的记载太少太零散了。笔者收集材料时，曾检索电子版《汉书》和《后汉书》“豫章”词条，结果发现前者出现43次，后者55次，基本与豫章郡地位逐步上升保持一致。又检索左右邻郡“会稽”和“长沙”，结果分别为会稽79次和115次，长沙158次和84次，都远远超过豫章。这些数字当然不足以说明实质性问题，但起码表明两汉书中涉及这两郡的人和事要比豫章丰富得多。于是，在史籍中爬来梳去的结果，看到的似乎又是秦征百越的翻版——汉武帝平定南越和闽越。不过，在这次大规模用兵两越中，豫章郡的军事地位进一步上升，不仅是通往两越的交通要道、军队集结和补给之地，还是与闽越交战的前沿阵地。故清人王谟曰：“盖秦汉之世，豫章尚为边郡，而汉制羁縻蛮越，多在此处。”^③当然，如果将“秦汉之世”改为“秦与汉初”应该更为贴切，因为两越灭亡后，豫章边郡的地位就不复存在了。此后至东汉，在三百多年漫长岁月里，豫章似乎又“沉睡”了，直到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才把它从“梦”中惊醒。

豫章郡人口的增长是秦汉江西史上最炫目的一个方面。东汉顺帝永平五年（140年）的户口统计数字是户406496，口1668906，分别比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统计的户67462，口351965，增长6.02倍和3.74倍，人口数在扬州排名第

①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北向户”，秦时泛指岭南今广东、广西至越南北部地区。

② 《淮南子》卷一三《汜论训》。

③ [清]王谟：《江西考古录·郡邑·新淦》，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